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

——张器友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徽学与地域
文化丛书

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

张器友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张器友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1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ISBN 978-7-5664-0865-5

I. ①桐… II. ①张… III. ①桐城派—文学研究
②新文学(五四)—文学研究 IV. ①I207.62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3546 号

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

Tongchengpai Yu Wusi Xinwenxue

张器友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ISBN 978-7-5664-0865-5

策划编辑:姜 萍
责任编辑:方 青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知耕书房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徽学与地域文化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吴春梅

编委会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利 张子侠 张能为 鲍恒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利 王国良 王达敏 王天根

王成兴 李霞 江小角 张子侠

张能为 张崇旺 张爱冰 张金铨

吴春梅 吴怀东 吴家荣 宛小平

陆建华 陈林 徐国利 鲍恒

序

周中明

器友同志与我相知相识 40 余年。我俩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只是分工有别：我从事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他专攻的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由于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殿军，又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在桐城派研究中我们走到一起来了。1999 年我曾出版过一本《桐城派研究》，最近器友的新著《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要出版，嘱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我欣然应允。

器友为人正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文革”期间，中文系师生举行的一次“批斗会”上，批斗我系一位因为私下非议“中央文革小组”某领导人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女教师，有人喝令被批判者“低头认罪”，她不肯低头，于是有人就上去强按她的头，她的头一抬，有人就上去打她。“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器友在人群中发出了这一声呐喊，全场震惊。有人私下嘀咕：“是嘛，摆事实讲道理嘛，何必打人呢？”有人则指责器友“不该给义愤的群众泼冷水”。器友的这一声呐喊令那位被批斗的老师十分感动，以致在二十几年后还给我讲这件事，可见器友为坚持党的政策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品德是多么难能可贵，令人钦佩不已。

器友为学勤奋。他 1969 届大学毕业，被“文革”耽误了很

多读书时间,但由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取得了累累硕果。他先后出版6部学术著作,成为安大中文系教师中的佼佼者。他对于延安文学研究尤其用力,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广受好评,颇具影响。

器友的新著《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我读后深感其有以下新意和特色:

一、该书从包括文学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最终落脚到文学上,避免了仅仅从文学谈文学的不足,视野较为开阔,因而较好地勾勒和阐述了桐城派二百余年的变迁。在指陈桐城派局限的同时,该书论述了桐城派自开宗立派之后,历经世致用思潮、启蒙思潮,不断地为五四新文学积累“文化势能”,得出桐城派是通向五四新文学的“路障”同时又是“桥梁”的基本观点。

二、该书采取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把桐城派视为一个发展变化的、具有多样性的、内部存在着差异性的、守成而又开放的文章谱系,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五四新人把桐城派视为一个凝固的、单质的、封建的“死文学”,斥之为“妖魔”、“谬种”的错误观点。具体分析了桐城派在五四新文学中的实际影响,从而揭示出五四新人“反传统”却又不可抵御地传承着传统,更新了传统。

三、该书还认为桐城派的掘墓人最初实由桐城派文化传统所孕育。该书具体论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桐城派末流”受到了桐城派的影响却又成为反叛桐城派的先锋,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这一历史过程。

四、该书对桐城派发祥地“桐城”作出了新的界定。该书指出,“桐城”不只是行政区划上的一个桐城县,而是以古桐城为中心的辐射周边的“桐城文化圈”。至于整个桐城派,则更是不限于桐城乃至安徽的地域文化,而是在整个清代文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影响全国的文派。

总之,该书别开生面,不落俗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资料、新的观点、新的境界,使我们无论对桐城派,或是对

五四新文学,或对它们两者的关系,皆可获得更全面、更正确、更透彻的新认识,令人备受启迪,获益匪浅。

器友的新著令人信服地说明,五四新文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绝非完全对立,而是有着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桐城派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开发的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过去由于它背着“妖魔”、“谬种”的恶名而长期受到学术界的漠视,甚至有人跟着采取粗暴贬斥、一棍子打倒的态度。历史事实应该得到尊重和正视。清代是封建末世,同时又是集我国封建社会之大成的时代,不只是政治上创造了大一统的局面,经济上繁荣昌盛一度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在文化上达到了光辉灿烂的高峰。以《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小说,以《长生殿》、《桃花扇》、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其成就之高超杰出,固世所公认,即拿清诗、清词的成就来说,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难道唯独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文是“例外”么?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收录的桐城派作者达 1223 人,《桐城文学撰述考》收录的桐城派著作达 2370 余种。如此众多的作家和作品,该是多么丰富、亟需研究开发的民族文化资源啊!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器友的《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虽然比拙著《桐城派研究》更胜一筹,但仍是属于综合性的研究,未免过于概要和粗略,还需要有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我于 2013 年出版的《姚鼐研究》就是试图在这方面开个头。目前我已年逾八旬,器友也年近古稀,俱老矣!更多、更好、更为深入的研究,只有寄希望于后来者居上了。对此,我们怀着热烈的期盼。

2014 年 8 月 18 日

于安徽大学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周中明

001 绪 论

005 第一章 桐城派的开宗

007 一 地域因缘

010 二 方苞、戴名世

017 三 刘大櫟

021 四 姚鼐

029 五 结语

030 第二章 桐城派的发展

030 一 经世致用思潮中的桐城派

057 二 启蒙新思潮中的桐城派

084 三 结语

087 第三章 严复、林纾译著的现代性曙光

088 一 严复的翻译

107 二 林纾的翻译

124 三 严复、林纾译著的经验 and 启示

135 第四章 五四桐城学案及桐城派的消亡

- 136** 一 五四新人对桐城派的批判
- 152** 二 桐城派的消亡
- 157** 三 五四新人对批判的反思
- 167** 四 桐城学案再思考

174 第五章 陈独秀与桐城派

- 174** 一 桐城派末流
- 179** 二 创办《安徽俗话报》
- 195** 三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 210** 四 出乎“桐城”，反叛“桐城”

215 第六章 新文学中桐城派的影响

- 215** 一 文学革命的认识论和价值理想
- 229** 二 桐城派文论的现代转化
- 242** 三 桐城派文风的现代回响

265 后 记

绪 论

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流衍二百余年,发迹于古桐城而流布国中,在古代和近代、现代之交,以其鲜明的个性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传承、变迁过程中的痛苦、矛盾冲突和精神意向,其守成、变迁、革新和消亡的历程,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历史经验。

桐城派起于清初、消亡于民初,是横陈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前不能超越、不能回避的重要存在。康乾之际,惩于明末以降形式主义学风、唯美主义文风和明代文人强学秦汉之失,方苞、戴名世、刘大櫟、姚鼐“四祖”毅然崛起,筚路蓝缕,开宗立派,力矫时弊。他们秉持文章的使命意识,关注以满族统治者为核心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寄希望于帝土共治的道学理想;持守宋儒理学,不废汉学考据,创立古文义法,以雅洁、渊雅为美,又喜雄奇恣睢,欲图振兴唐宋古文传统。进入近代,桐城派由一地影响全国,因一派而生衍众多支流。众水纷流之际,有恽敬、张惠言主导的阳湖派在先,曾国藩主导的湘乡派继后,得经世致用的时代精神,涌浪崛起。他们尊方、刘、姚为师,以桐城派古文为学习的正宗,又反思桐城古文的不足,突破藩篱,扩大学习的取径范围,引骈入散,各自以激扬壮阔之气陶铸雄声,丰富和发展了创立时期的桐城派古文传统。再后,启蒙新思潮排浪而至,吴汝纶总揽桐城派诸家,严复、林纾创造性运用古文翻译西人著作,“传输欧化”,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张裕钊、吴汝纶以莲池书院为中心,承续湘乡派的路径又回望开宗时期的气象,融醇厚与宏肆于一冶,形成了桐城派最

后一个旁支莲池派,在守成中迎纳西学,彰显了桐城派消亡前的夕阳光光。

这是一个守成而又不断革新的文化和文章谱系。处身千年未有的变局,一代又一代的桐城派继起者,发扬“通时合变”、“与世变相应”的桐城派“变易”传统和“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文章精神,以积极入世的士子情怀致力于封建国家的改良、多民族和谐与共和民族现代化的探求。历汉宋之争、中西之争和“文界革命”,从信守宋学、兼容汉宋,到抛弃汉宋轸域,会通中西,执西用中,文化思想和文章观念在剧烈的冲突和论争中不断走向新变。其中,姚莹、郭嵩焘、曾国藩、薛福成置身于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前沿,“开眼看世界”,成为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先锋。他们讲义理之学,但在经世致用的前提下将学问、文章之事引出书斋,引入经济,走向世界,“坚车行远”。洋务运动破产、甲午海战失败后,吴汝纶、严复、林纾继前辈之后,以更大的气魄,“开风气之先,绾新旧之枢”,把桐城派的文化思想和文章精神推向近代启蒙新思潮及文界革命的前沿。他们持守民族本位,批判、反思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误,仿佛三足鼎立,分别从教育、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三个方向传输西方近世文明,运用西方近代教育、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观念阐释和转化传统,高度重视教育、学术、文学在开启民智中的作用,他们的思想成果构成启蒙新思潮和“文界革命”成果的重要内容,是直接通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桥梁。

但是,沉重的封建理学和传统文化使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始终持守着传统本位的立场,最终陷落在文化改良主义的固辙里。这个处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交接点上的文章学派,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纠结开放、保守于一身,坚持政治改良,反对政治革命;坚持文化改良,反对文化和文学革命;坚持古文之不当易,反对白话正宗和白话独尊,以至于在打开从古代通向现代的闸门、唤醒了一个文学新时代之际,却又反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在为五四新文学铺路架桥的同时,却又变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的路障。

“路障”和“桥梁”显示了桐城派正负二重性功能特征。五

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兴起之时,从桐城派文化土壤里走出来的桐城派末流陈独秀等人,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传统的不合时宜,率先对桐城派发起攻击。陈独秀所统领的“安徽俗话报派”出乎“桐城”却不再归附“桐城”;他所统领的“新青年派”视桐城派为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中的“妖魔”,把桐城派中人视为“桐城谬种”,酿成了可称之为“桐城学案”的文化批判。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五四新人在“反传统”的战斗中丰富了传统;桐城派也因为新的时代、新的经济政治因素的增长和封建国家的坍塌失去凭依,最终走向消亡。

显然,人们在认识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时,如果片面地指责五四新人的革命显然有悖于常识,但是如果只是注意到桐城派作为“路障”的一面,对其作为“桥梁”的一面熟视无睹,那也失之公允。遗憾的是,这种非科学的“熟视无睹”是严重存在的。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桐城派总是被简单地归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对立面,人们在清算桐城派儒家正统观念和文化改良主义的同时,对于其倾向于进步的历史成就,对于其代表人物进步的文化思想、卓越有致的文论和文学成就,总是不予认真研究,或者有所研究却不顾他们与桐城派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对传统文化热情的上升,一些学者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关系时,开始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认识到必须切实地对五四前几乎贯穿和笼罩了有清一代文坛的桐城派采取历史的辩证的眼光。但是对这个聚传统文化和文学于一体的典型文章学派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关系,对其在传统文学的“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实际意义,还未能有认真深入的考察。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它不但关乎桐城派在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关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源流、成就及其科学评价,关乎21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

之所以未能对桐城派作出科学的评价,大体说来,原因有四:其一,受制于“突变论”的桎梏。现代学术研究曾经有过一个思维定势,即五四开出了一个新的世纪,政治、历史、文学诸学科都持守这种观念。在这种阐释定势的作用之下,总以为五四前都是旧的、落后的,五四后都是新的、进步的。其二,片面

地把桐城派当成政治思想守旧派作总体性概括,而未能深入辩证地、全面地、动态地分析桐城派的文化结构及其学理内含,持守了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史以反帝反封建作为新文学开端的文学史模式。其三,只是把桐城派作为一个散文流派,并且在把它当成散文流派时又只是看到其在文字上坚守古文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对立,而未能顾及其文学观念、艺术风格、写作方法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更未能正视桐城派后期严复、林纾的译作开五四新风的前导性价值。其四,学术立场没有走出五四之初新文化人物激进论战斗姿态的阴影,思想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

这些,当然是不好的,但又是多么宝贵的教训!今天,处在民族复兴的又一个新世纪的伟大起点,如何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学艺术,如何在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舞台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将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科学地审视和考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关系,显然与这个课题密切相关。因此,本书希望秉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的、美学的批评精神,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考察桐城派的历史沿革及其不断地为五四新文学积累和提供文化势能,以及最终受到五四新人扬弃的情状,总结历史经验,以回应时代和民族的呼唤。

这个呼唤是如此的真切。它出于现实,呼应未来,也源自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反对党八股》,人民出版社1966年根据1953年5月北京第1版重印,第833页。

第一章

桐城派的开宗

桐城派大约起于 17 世纪后期康熙年间方苞、戴名世的相交相识,迄于 20 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这是一个主体为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致力于古文写作与研究,同时经营经学、西学等其他学问,积极事功的文章学派。

桐城派称谓的出处,见于清季的文人口碑和一批文人的归趋。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说:“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里,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①其后,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又说:“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摹仿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櫟,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亦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②

桐城派因前驱者系桐城籍文人而得名,但它绝非纯地域性文章派系,而是一个影响广大、传承变迁二百余年的重要文章学派。其所作所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可称为继唐代古文运动、明代复古运动之后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的古文运

①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114 页。

② 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文正公全集》,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1590 页。

动。桐城派的旁支湘乡派的重要成员薛复成说：“自淮以南，上沂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①他没有提到北方，其实京城北京及京畿津、冀等地，也都是桐城派的重要活动地区。

中国古代文学在先秦时期，散文与歌诗辞赋并驾齐驱，隋唐以后，唐诗、宋词构成文学史的主流，虽有唐宋古文运动欲振兴先秦精英古文，“变浮靡为雅正”，但随着元、明、清时期长篇叙事文学的崛起，精英古文到晚期已沦落败坏，难以收拾，所以黄宗羲感慨地说，“世无文章已久矣”。^②这显然不利于文学多样化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桐城派的崛起，当然不可能改变文学史主流的路向，但“力延古文于一线”的努力，也从一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光复了古文创作的生机，以至于获得“古文辞不让唐宋人”的赞誉。而且，它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经历了汉宋之争和中西之争，立足通变，持守和转换传统，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准备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提供了宝贵经验。它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之间，在中国和西方的会通之处，搭建了一座历史性界碑，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终结，同时又是通向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桥梁。

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章学派。它在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文章家，同时又是学者，而且一些人还有立朝为官的经历。他们执着于道统与政统的一致、文化立场和政治伦理的一致，并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处身明清易代之初和封建末世，他们总不能摆脱与政治的关联；惟其如此，融文化、经济、政治于一体以施事于文章，就成了桐城派几代人的主要功业，同时也成就了这一派人世代相传的文章精神。

① 薛福成：《寄龛文存序》，《城派文论选》，贾文昭编著，中华书局2008年，第389页。

② 黄宗羲：《山翁禅师文集序》，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69页。

一 地域因缘

一个文化学派、文学流派的出现是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地域因素常常不可或缺。

桐城派发祥地“桐城”(含今之桐城县、枞阳县全部以及周边舒城、庐江、无为、怀宁、潜山、岳西诸县的部分区域和安庆城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北岸,大别山余脉断



姚鼐祖居之地麻溪一角

断续续消残于境内,白荡、白兔、菜子、嬉子诸湖镶嵌其间,龙眠、岱鳌、投子、皖公(天柱)、挂车、浮山、白云、拔茅诸峰挺秀其中,山环水抱,乡民多以鱼米为生,耕读传家。桐城派诸代表人物都曾因桐城山水以及由这山水所孕育的文化而自得。戴名世说:“桐城居深山之中,地方百余里。一面滨江,而群山环之,山连亘千余里。与楚之蕲黄、豫之光固,以及江淮间诸州县,壤地相接,犬牙错处,虽山川阻深,而人民之所走集,皆为四通之渠。”“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义之邦。”^①姚鼐说:“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②刘开说:“余观枞阳之地,外江内湖,群山为之左右,峰势喷薄,与波涛互相盘护,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士生其际,必有不为功利嗜欲所蔽,而

① 戴名世:《予遗录》,《戴名世集》,刘季高校点,王树民编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10页。

②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惜抱轩诗文集》,吴孟复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以气概风节显于天下，而女子节行之嘉犹未足以尽之也。”^①他们所谈表露了对故里的赞美，不排斥主观的偏好，但确也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角度说出了桐城派赖以产生的地域因缘。后期非桐城籍桐城派重要作家张裕钊对此也颇有感慨。他说：“间独闻龙眠、浮渡诸山水，古所称绝胜也。姚氏之言，以谓黄、舒之间，山水奇杰之气，蕴蓄且千年，宜有儒士兴于今，理固当有是邪！向时往来楚汉之交，泛舟浮大江中流，望皖西北诸山，隐然出云表，其隆岑秀异，绝可伟也。”^②言语之间透露着惊异和神往。

另外，桐城与南京虽有长江相隔，但是两地联系甚密，有明一代文人宦者交往频繁。戴名世曾经提到：“明高皇帝起江北，定中原，王迹实由此兴，而建都南京，则桐为王畿内地，自是天下承平三百年，桐士大夫仕于朝者冠盖相望，而持节钺为镇抚者遍天下。”^③京都政治、文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是明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枢纽。）无不给予桐城以重要影响。其中江南士大夫结社讲学之风、明清易代之际江南士大夫志节之气，都在桐城文化中投下了深重的影子。方苞祖上迁居江苏上元（属南京）后，他的家庭实际上成了两地文人聚集、交流之地，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都曾经生动记述过他们往还于南京、桐城的聚散交谊，以及与江南士大夫的谈学、交往情况。

而且，这里的文化尤其与徽州婺源、江西有着深厚的关联。元明时期，或动因于朝廷，或动因于民间，外乡人不断大举迁桐，与方苞、戴名世同一时期的桐城文人朱书曾经在文章中说过，元以后，皖（实以桐城为中心）人“强半徙自江西”。^④戴名世

① 刘开：《刘孟涂集》卷9，《枞阳节孝祠记》，《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一〇·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95页。

② 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附录》，《张裕钊论文》，见王达敏：《张裕钊诗文集》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③ 戴名世：《予遗录》，《戴名世集》，刘季高校点，王树民编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10页。

④ 见阡城一叶：《从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说起》，2004年4月20日《安庆日报》。